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只有穿的人才知道鞋子合不合脚

□康 伟

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我们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一定要有定力、有主见，决不能自失主张、自乱阵脚”。

走路要穿鞋，但走什么样的路穿什么样的鞋却大有讲究。穿错了鞋不仅走不好路，还会折腿伤脚。这恰如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选错了道、走错了路，可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总书记用穿鞋来比喻一个国家道路的选择，微言大义，生动形象地指出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近代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我们曾经没“鞋”可穿：“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我们也曾试图穿别人的“鞋”，“走俄国人的路”。经过一次次艰辛尝试和探索，我们终于选到了自己要穿的“鞋”：“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是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百年实践中得来的。这条路，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我们成功选择了一双合脚的“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擦亮眼睛，认准自己的“鞋”。当前，各种“主义”乱花迷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粉墨登场，恰如市场上出现各种千奇百怪、花样翻新的“鞋”，带来了很多诱惑。我们必须准确分辨，旗帜鲜明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我们全面认识、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

另一方面，要把“鞋”穿好，昂首阔步迈向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同时，要坚持发展的观点，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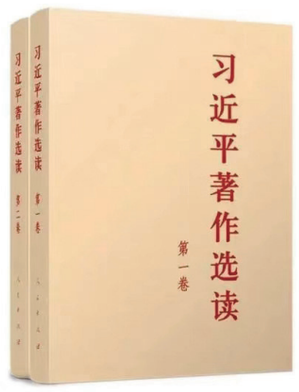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战略任务来抓

——读习近平总书记《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张丽丝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2014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揭示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要求，指明了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精神力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思想依据，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民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民族工作要见物，更要见人。思维是人的重要属性，是人的行动来源。做好任何工作，都需要有科学的认知来支撑。做好民族工作需要正确的思想认识，才能把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到位。反之，错误的认识会对民族工作的开展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这篇重要文献中体现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辟深刻，切中民族问题的要害，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推动民族工作，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丰硕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物质力量的运用强一些，精神力量的运用弱一些。”维护民族的团结，只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还不够，现在我们民族问题的成因更多在于精神方面，必须用正确思想占领民族领域的思想阵地。长期以来，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实际上，在民族领域的思想阵地，同样面临着尖锐的矛盾与复杂的形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更加隐蔽和剧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好民族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必须深刻认识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旗帜鲜明反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增强各族干部群众识别大是大非、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思想渗透的能力。换言之，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思想观念，从而实现对西方民族理论与错误思潮的批判与超越。

提出增强文化认同对于民族团结的深刻意义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从文化构成来看，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诗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各民族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在长期交流互鉴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融合了各民族的共同思维模式、价值理念、政治心理与民族性格，促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建立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需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提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克服两种错误。一种是将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另一种是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少认同。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虚化、窄化中华文化，将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都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引导各族群众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阐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

对于如何抓好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作出了深入回答。第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能够源远流长，得益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与共生共荣的多元文化底蕴。自先秦时期的“五方之民”共天下，到汉王朝的“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而至“文景之治”的盛世，再到大唐兼容并包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心态，这种维护一统又包容差别的理念与历史，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需要延续这一理念，在全社会、各民族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从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

第二，重视培育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青少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之义，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理想信念的支撑和指引。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中生根发芽”。

第三，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论述精辟阐明了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创新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为促进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明了前进方向。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首先要建立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体量相对较小，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面临着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双重压力。各民族要坚持正确的历史文化观，推动互学互鉴、交融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总之，这篇重要文献是对新时代民族工作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使命与任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精神力量与思想基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翻译经典著作要坚持“中国化”导向

——翻译家张仲实的治学之道

□刘小蒙

学人小传

张仲实（1903—1987年），原名张安人，陕西陇县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翻译作品主要包括：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讲话》、拉比杜斯与奥斯特维强诺夫合著《政治经济学教程》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列宁传略》等。

张仲实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为后人留下近千万字的翻译成果和思想论著。“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

总结学好外语的五条经验

张仲实的翻译生涯始于莫斯科。五四运动后，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领导渭北地区的学生运动，并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传播者。1926年，他进入上海大学读书，之后受派赴莫斯科学习，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逐步开始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与研究工作。

其实，在赴苏之前，张仲实并不识得俄语，甚至都不认识俄文字母。当他人忙着置办出国的衣物时，他用身上仅有的9元钱购买了一本日俄辞典——《露和大辞典》。这部辞典后来成为他“形影不离的俄语导师”。刚到苏联时，张仲实就意识到，要想学懂理论，必先学好俄语，而学俄语主要又得靠自学。于是，他一有空就学习俄文，即便是在周末，也要早起来到教室，关起门来看辞典、读俄文。

1937年，张仲实在《我学习俄语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他说：“第一，手边一定要有一本好的辞典；第二，自己要有恒心，能耐烦地去时时翻辞典。能具备这两个条件，定可保证你成功。”后来，张仲实还进一步总结出学好外语的五条经验：一是下苦功、要勤学，每日必须拿出一定时间进行自修；二是多读多看，看外文报纸上的简短消息或杂志上的短文章，读浅近的小册子或书籍；三是要搞通文法、掌握这个语文的规律；四是要勤查字典，吃透词的涵义；五是练习作些翻译，可采用“对译”方法，先由外文译为俄文，然后再把俄文译成外文。

经过不断努力学习，张仲实的俄语水平进步惊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迅速提高。1928年，他与张闻天、博古等人一起被编入翻译班，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翻译。在苏联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俄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日后从事翻译和理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提出研读马恩经典原著的方法

20世纪30年代，张仲实在上海、武汉、重庆和新疆等地研究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完成的上百篇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译作在《时事类编》《世界知识》和《大众生活》等刊物上发表，在思想舆论界产生广泛影响。

1940年5月底，张仲实到达延安，由此迎来了翻译生涯的“黄金期”。在延安，他先后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等职务，负责编译出版《马恩选集》《列宁选集》。他还常到陕北公学、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王震回忆，“当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偏僻的山沟里，我们的许多同志不管条件如何艰苦，都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就有张仲实同志编译的”。

为了配合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张仲实专门撰文向广大党员干部介绍研读经典之法。比如，为鼓励大家读原著，他特意引用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来说明“学原著”的重要性：“要从原著里去研究这学说，而不要向复述者学习。”针对一些党员读不懂《资本论》的情况，张仲实在《怎样研究〈资本论〉》中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研读前可以根据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了解一些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和方法；研读时，不用担心有些地方可能一下子难以理解，重点是要努力去领悟马克思的术语和他的叙述文体；读经典著作要多次反复且深入思考，才能领略真谛。他还强调，“列宁很熟悉马克思，他把他的作品读好几遍，读了再读”。心急是有害的，深刻地通晓理论，不是“简单地阅读或死记几页，而要彻底理解读过的，把它加以深思，融会贯通”。

将翻译工作与理论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是张仲实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心得。他认为，翻译工作者只有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翻译水平，才能把相关著作翻译准确。

将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相结合

张仲实主张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精通创造性的马列主义”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列举“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例子加以说明：与孟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弄成“表面的类比和玩弄引证的教条”所不同，列宁并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作教条，而以先进科学底代表者，估计新的历史经验，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底理论”。在张仲实看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

张仲实从事翻译长达半个多世纪，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尽快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中央拟定了一个学习理论的“干部必读”书目，共有12本。其中《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简史》均由张仲实编译，同时他还是《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的参编者之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这套丛书成为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备读物。1953年，中共中央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便有计划、分步骤、成体系地译出相关理论书籍。张仲实长期担任该局副局长，由始至终，兢兢业业，还亲自审定了一些译稿。经过多年努力，《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继出版，为党的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此外，张仲实还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撰写了诸如《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列宁传略》之类的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及性读本，受到各方好评。

张仲实在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值得后世继承发扬。在他看来，熟练掌握外语是翻译工作的基础，而学好外语有赖于“勤学”和“对译”。在此基础上，翻译者要坚持理论研究，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以求得思想文化层面的“融通”。更重要的是，翻译经典著作要坚持“中国化”导向，使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更好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

